

LI SHI DE GAO FENG



历史的高峰

刘泰隆 著

——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高峰

——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



刘泰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
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
刘泰隆 著

责任编辑：龙子仲 郑纳新

封面设计：张 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2 字数：329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633-2747-9/I·251

定价：18.00 元

桂林文化城

——鲁迅研究的历史高峰

(前言)

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到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之前,中外的大批文化人聚居在桂林,掀起了蓬勃发展的抗日文化运动,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胡愈之《忆长江同志》),故被全国誉为“桂林文化城”。本时期中外作家在桂林撰写或出版的研究鲁迅的论文有130多篇,专著有10多种。经过几年来的阅读、探索,我写成了一篇《略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曾于1993年冬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在广州召开的“鲁迅研究新路向”专题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漱渝研究员、副秘书长张梦阳研究员、《鲁迅研究年刊》主编阎愈新教授等当即发表评论,认为这篇论文“是开拓了鲁迅研究地方史新领域和鲁迅研究阶段史新领域的第一篇好论文”。讨论会期间,张梦阳和其他不少同志还同我详细探讨了鲁迅研究的许多问题,一致认为全国的鲁迅研究在抗战时期出现了空前高潮,当时的桂林文化城就是这个高潮的中心,桂林文化城发表和出版的不少鲁迅研究论著都称得上鲁迅研究的一个历史高峰。他们希望我沿着这篇论文的路子再深

入下去，扩充成一本《鲁迅研究的历史高峰》的专书。同志们的鼓励使我很感动很兴奋，但也感到任务艰巨，担心付出了努力未必能收到实效。因为鲁迅研究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都算得 是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经过了中外鲁迅研究工作者将近八十年的努力，皇皇巨著，汗牛充栋，高手如林，新秀潮涌，而我见闻有限，加以年近古稀，可能力不从心；然而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经四十余年，读鲁迅的书和关于鲁迅研究论著所花的时间最多，又是生活于桂林，我认为继续这项工作责无旁贷。所以我决心尽力为之，至少也为这个研究课题留下一点思考资料。我这本书的正名就用《历史的高峰》；副题为《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精华探索》。在这个“前言”里谈如下三个问题：

一、历史高峰的主要事实

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鲁迅研究历史的高峰，这可说是鲁迅研究史专家们的共识。1986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良骏同志著的《鲁迅研究史》上卷第193页写道：“鲁迅研究的开拓期（1937—1949）”，“鲁迅研究的成果，甚至超过了从滥觞期（1918—1927）到发展期（1930—1936）的整个研究成果之和”。第198页又写道：国统区的鲁迅研究工作“取得了最为突出的成绩”。他列举了这时期国统区为鲁迅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胡绳、胡

风、聂绀弩、荃麟、天翼、艾芜、欧阳凡海、吕荧、辛勤、虹飞等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抗战时期旅居桂林或在桂林发表、出版了鲁迅研究重要论著者。

现在再将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是全国解放之前鲁迅研究的高峰的主要史实简述于下：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江泽民同志《在鲁迅诞生 11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重申了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这个总体评价，号召全国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韧的战斗精神和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台湾《古今艺文》杂志 1997 年 8 月号发表张觉的文章，高度肯定毛泽东对鲁迅的论断“指明了鲁迅对于中国现实社会所起的革命作用”，认为“在我们的时代，还应该以鲁迅精神去学习鲁迅、研究鲁迅”。“鲁迅的战斗对现在还有用。”“鲁迅凭其文学成就虽足以留芳百世，但抛弃了鲁迅的革命性这闪光的一面，便是抛弃了鲁迅的灵魂，使鲁迅丧失了现时还富有活力的批判的锋芒。”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和张觉的文章，代表了到了 90 年代的今天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至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的一般知识分子，仍然认为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这可以说是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人民）对鲁迅的总体的最高认识。非常可喜的是桂林 1939 年 12 月 4 日出版的《救亡日报》发表的美国史沫特莱女士的《论鲁迅》，她说鲁迅可以比之于高

尔基、可以比之于伏尔泰，可以比之于威廉·迦尔逊。众所周知，高尔基是世界闻名的俄罗斯的伟大文学家，伏尔泰是闻名世界的法国伟大启蒙主义思想家，威廉·迦尔逊是誉满全球的反对黑奴制度的伟大首领。史沫特莱对鲁迅作出这样崇高的评价，同毛泽东同志于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上述评价不谋而合。桂林当时发表史沫特莱这篇重要文章，表明当时革命文化界已拥护这个评价，是对鲁迅的总体的认识的高峰。

具有世界意义的阿Q典型问题争论直到现在依然意见纷纭。桂林文化城关于阿Q典型问题研究的非常可贵之处在于：“中国国民精神的综合”说和从“阶级性”出发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说不仅同时并存，而且像邵荃麟等人就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可以成立的。这到今天仍然显出其深刻性，还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关于精神胜利法的根源、普遍性、长期性、危害性等问题的论述，更是达到了我们认识的顶峰。有些至今仍未有人触及。

鲁迅杂文研究受到很大的重视，冯雪峰、宋云彬、欧阳凡海等人的论著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被称为“鲁迅的哲学”的《野草》的研究，聂绀弩撰写了《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邵荃麟写有《鲁迅的〈野草〉》，陈紫秋撰述了《论鲁迅先生的诗》；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野草》研究的三篇名文，前两篇都写于桂林，后一篇虽然不写于桂林却在桂林的刊物上发表。

40年代初全国鲁迅诗歌研究的高潮中，桂林发表的木犀的《鲁迅氏的旧诗》，是对鲁迅旧体诗论述最全面最

深刻的一篇。他的关于鲁迅旧体诗“是最传统的而又最独创的”科学论断，实际上指出了鲁迅是中国传统诗的最大继承者和现代旧体诗的最大开创者。

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中有不少是属于开拓性的。例如：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是整个鲁迅研究史上的第一部鲁迅评传。路沙编的《论〈阿Q正传〉》，是在他编选的由重庆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阿Q——鲁迅名著评论集》的基础上增加了荃麟的《也谈阿Q》，并将鲁迅原著《阿Q正传》和《〈阿Q正传〉的成因》作为附录而辑成的，是《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抗战时期的《阿Q正传》主要研究成果的最及时的结集。宋云彬在1940年夏季为中国抗敌文协桂林分会主办的文艺讲习班讲授的《鲁迅杂文研究》，是鲁迅作品教学史上最早的《鲁迅杂文研究》专题课；1940年10月巴人的专著《论鲁迅的杂文》与同时问世的《鲁迅杂文研究提纲》，可以称为鲁迅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鲁迅杂文综论”的双璧。宋云彬于1940年10月出版的《鲁迅语录》，在全国解放之前的鲁迅语录出版史上虽然算是第二本，但发行量和影响力却居首位。

此外，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方法和开展鲁迅研究问题论争的方法也跃上了一个高峰。鲁迅研究方法中最值得重视的先提两种：一是胡风在《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中提出的“只有在和作为战士的他底道路以及作为诗人的他底道路有机的联系里面”才能把握鲁迅的特点，这是符合辩证研究法的；二是茅盾在《“最理想的人性”》

一文中提出的要从鲁迅留学弘文书院时常与友人谈到有关国民性的三个问题入手把握鲁迅思想的中心,直至今天仍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至于围绕鲁迅问题的论争则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如果是属于对鲁迅和鲁迅研究者无理或无知的谩骂,前者则揭露其反动本质,后者不予理睬或以短信作答,指出其不正确态度,让读者去明辨是非,而都不“以骂还骂”;如果是出于偏见,则据理驳斥,对其错误绝不留情,对其人还是抱诚恳爱护的态度;如果纯粹是学术性讨论,则提倡自由争鸣,心平气和地说理,既鼓励批评也鼓励反批评。

二、历史高峰的成因

世界上的任何奇迹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抗战时期出现鲁迅研究的空前高潮是形势的需要。抗战时代是中国人民在一个最黑暗最严重的形势中,艰苦地争取我们的国家民族不遭日本帝国主义灭亡而能继续生存的时代。“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①“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地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的处境中,预见与确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信有光明的将来。”^①因而，在那极其困难艰险的岁月和征途中，全国人民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拼搏，如果没有像鲁迅那样的坚强性格、伟大精神和伟大理想，怎能生长出无比的勇气和强力呢？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不分任何政党以至政治立场同鲁迅根本对立的人也大声疾呼要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原因。长期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将军亲笔稿《鲁迅先生研究纲领》开头写道：“鲁迅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鲁迅。学习，研究，发扬他的学术作品和为人民而战斗的精神，这也是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权利和义务。”^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说：鲁迅一生的工作，“恰恰是在尽力唤起我们的民族意识，坚强我们的抗敌情绪”。希望大家“继续鲁迅先生这种为民族革命而努力的精神，用文艺的力量，参加抗战建国的工作，争取我们的国家的独立与生存，完成我们在抗战建国期间文艺界应尽的职责”。^③鲁迅研究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全国和全民族空前需要的形势中出现了空前的高潮。

抗战时期鲁迅研究空前高潮的中心为什么出现于桂林而不出现于重庆或延安呢？根本原因是在政治环境方面桂林优越于重庆，在经济环境（物质条件）方面桂林优越于延安。当时，桂林是桂系势力的中心，桂系统治下的广西是当时所谓“模范省”，在政治、思想、言论上采取所

① 周恩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题词》。

② 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9期，51页。

③ 潘公展：《纪念鲁迅先生的意义》。

谓“开明的姿态”，经济上相对富裕稳定，同时在抗战之初离主战场较远，生活也就较稳定。桂林占有这两个优越条件，所以吸引了大多数来自国内外的革命的文化人；前后办起书店、出版社共180多家，出版的杂志近200种，各类图书杂志，不少畅销内地、港澳，以至南洋。这也就是为什么桂林被称为抗战时期全国第一文化中心的原因。

桂林文化城的不少鲁迅研究论著为什么能成为抗战时期全国鲁迅研究的最高峰？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论著的作者，不仅理论修养和创作实践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思想感情性格都几乎是“鲁迅化”的了，可以说当时的桂林形成了一个“鲁迅化”的作家群和鲁迅研究专家群。胡风、冯雪峰、聂绀弩这些鲁迅的传人自然是“鲁迅化”的代表人物，其他如邵荃麟、宋云彬等等也是“鲁迅化”的作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其中的胡风、聂绀弩、邵荃麟等人还是杰出的鲁迅研究工作的组织者。例如聂绀弩于1940年来桂林任《力报》副刊《新垦地》主编直至1944年秋离桂赴渝，除自己写长诗和论文歌颂、研究鲁迅之外，还经常动员其他进步作家、艺术家对鲁迅著作和生平进行研究，写出论文和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杂感、诗歌、剧本、版画），宣传鲁迅的功绩，反击诋毁鲁迅的言论。邵荃麟更是桂林地下党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从1941年春来到桂林直至1944年9月离开桂林，成为继胡愈之之后对桂林文化运动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人。在文艺工作方面，周扬和邵荃麟都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分别是延安和桂林的文艺工作主要领导人，就理论水

平和才干来说可能周扬比邵荃麟都更高一些，但周扬是共产党的文化官，邵荃麟则是“共产主义圣徒”；周扬尊鲁迅为“精神界之战士”，邵荃麟则奉鲁迅为“导师”；周扬将萧军等至多是作为“同路人”相待，邵荃麟则视胡风、冯雪峰等人为“兄长”、“老朋友”；周扬工于心计，善于权谋，邵荃麟则质朴、坚毅，善于团结人、乐于肯定每个人不同的长处；这也许是桂林文化城比延安这块革命圣地更利于出现鲁迅研究佳作的又一个原因吧？

总之，抗战时期出现鲁迅研究空前的高潮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历史必然性遇到政治环境比重庆优越、物质条件比延安优越和有“鲁迅化”的作家兼鲁迅研究家群的桂林，就使桂林在这一时期发表出版的不少鲁迅研究论著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三、我怎样研究这个历史高峰

时代的车轮进到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来研究鲁迅和挑剔鲁迅研究论著者不是没有了，而是大大减少了。但是专门从鲁迅身上和过去鲁迅研究论著中找缺点以显示自己思想开放或见解新颖者虽然不能说成了时尚，然而还大有其人。我认为这些人的研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道的，有损于正直的中国人的为人之道。我们研究鲁迅和研究过去的鲁迅研究论著不是不可以谈其缺点和局限，而是必须把握这些缺点和局限在其整体中是属于很次要的东西，可以指出瑕疵，但决不能

以瑕掩瑜。鲁迅是“民族魂”，这是从 30 年代至今为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鲁迅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鲁迅著作是我们现代民族文化的经典。美国《社会文本》第 15 期 1986 年秋季号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发表的《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就很中肯地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作品是“中国文化的民族寓言”，“阿 Q 是被外国人羞辱的中国”。这一切都说明鲁迅及其著作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精华。对这一份民族最优秀的精华的研究，我很赞同有人提倡过的应用“精华解剖研究法”，像希腊研究荷马，意大利研究但丁，英国研究莎士比亚，德国研究歌德，俄国研究托尔斯泰，法国研究巴尔扎克的本质一样，去研究鲁迅及其艺术的本质和特质。对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我也着重选择其中最精华的部分进行探索，并尽可能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鲁迅及其著作的宝贵借鉴。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搜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它为我开展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的研究工作指出了具体步骤和途径。以研究桂林文化城的阿 Q 典型论为例，我分为四步：第一步“占有材料”而且“必须充分地”。我除读了桂林文化城论阿 Q 典型问题的全部文章，也把鲁迅研究史上讨论阿 Q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典型问题的主要资料都找来读了。第二步“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我读了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的几十种不同看法(光是1978年8月上海师大中文系资料室辑录的资料就已经多达40多种),并拿来同桂林文化城出现的两种主导看法加以比较分析,我认为这几十种不同看法的主要表述形式实际上也可以归为两种。第三步“搜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我认为这两种表述形式的“内在联系”,即或立足于“国民性综合”说,或立足于“阶级(阶层)典型”说。第四步将“现实的运动”“适当地叙述出来”。我完成了上述工作之后,就将关于阿Q典型性问题的几十种看法梳理成了两条主要发展线索,指出了这两种阿Q典型论各自的合理性与不足,从而比较正确地评价了桂林文化城两种主导看法的成就和局限性,并初步总结了从40年代末至80年代阿Q典型研究方面的一些经验教训。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的重要性,还表现于它是研究工作的一种重要基础和最好途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集成。没有材料,集成就无从着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创新。“观今宜鉴古”,开来应知先。只有在前人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攀登,才能真正创造新纪录。盲目创新就有可能重复创造出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造成社会的浪费;也有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辙,走冤枉路。当今大家都重视创新,有新观点的文章和著作很容易发表和出版,这应当说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对集成的文章和著作采取忽视和轻视的态度,往往斥之为

“炒旧饭”，我认为这对社会是不利的。因为任何文化建设，固然要依靠创新发明，同样也依靠集其大成、发扬光大，我国古代的孔子和现代的鲁迅都是集大成者；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创新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结果都是不好的。我认为研究工作比较好的方法是在集成的基础上创新。我研究桂林文化城阿Q典型论是在集成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两种主导看法不是相斥的而应当是互补的关系，进而就在阶级论和精神现象学的结合点提出了对阿Q典型的一点新的看法；研究鲁迅旧体诗时也是在总结鲁迅注重锤炼的经验过程中，发现和提出了“鲁迅旧体诗的‘十炼’”这个看法的；同样，对《阿Q正传》的创作方法也是在集成的基础上作出了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新论断。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种好方法。我研究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论著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的重要关键是用来比较的东西必须选准。我选来比较的是全国以至全世界鲁迅研究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成就。用这些最高成就来对比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论著，被肯定下来的东西就是其突出成就和历史贡献，被否定的东西就是局限性，由此再思考当时的研究者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就和存在这些局限性，能使我们得到启发的东西是相当多的。我这样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读者从中不仅看到鲁迅研究史上桂林文化城这座历史的高峰，而且也看到全国全世界的当代的高峰，因而像谈到当代阿Q典型论时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陈涌和张梦阳两位

同志的看法；同时也希望读者认识这项研究并未到达终点，还大有研究前途。

文学批评理论、方法与术语，有西方的，有中国古代的，本书根据各种具体需要都进行试用。例如“趣”与“味”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属于不同的审美范畴，本书就以这种理论为武器剖析出鲁迅杂文既多趣又多味；就“趣”而言至少包括有理趣、奇趣、情趣、形趣、语趣等等，就“味”而言至少有新味、熟味、辣味、笑味、回味等等，自我感觉这比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分析鲁迅杂文趣味性所获得的认识广博得多。研究鲁迅旧体诗的艺术性，我比较侧重地借鉴了古代诗话，从而对前人关于鲁迅旧体诗“是最传统的又是最独创的”这个正确论断作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说明。但是我全书运用得更多的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就研究方法而言，包括了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及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阐释学等等。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政治，特别像直面人生、干预社会现实的鲁迅和鲁迅著作，自然便与革命的政治结了解之缘。我们的鲁迅研究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也就必然要联系当今的社会人生，因此我的研究中也有些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色彩，像评邵荃麟的《阿Q的死》的意义便是这样。

总之，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个“大杂烩”，加上我不能熟练掌握，存在的问题肯定不少，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

目 次

前 言 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的历史高峰	(1)
本书的写作缘起——历史高峰的主要史实——历史高峰的成因	
——我怎样研究这个历史高峰	
第一章 鲁迅研究的历史概况	(1)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草创时期(1913—1927)	(2)
傅斯年吴虞评《狂人日记》——茅盾的《读〈呐喊〉》等文——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两本最早的鲁迅研究文集——罗曼·罗兰等评鲁迅——本时期的鲁迅研究特点	
第二节 鲁迅研究的迂回发展时期(1928—1936 年鲁迅逝世前)	(6)
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民族主义文学”等的“围剿”——表现了清醒的马列主义观点的冯雪峰的评论——瞿秋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本时期的鲁迅研究特点	
第三节 鲁迅研究的开拓时期(1936—1949)	(9)
鲁迅逝世头几个月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崇高评价——抗战爆发后全国形成鲁迅研究三大战场——《鲁迅全集》和《鲁迅先生纪念集》等书的出版——研究领域的巨大开拓——争鸣和斗争	